

漫步富世話從頭： 執行教育部計畫的個人經驗談*

蔡佑霖**

摘要

在臺灣晚近一波的高教轉型過程中，競爭型計畫的出現是一個特點，教育部持續以競爭型計畫推動各種教育實驗，也連帶地改變大學中教育資源的分配方式，如今有不少經費分配是教師需要提出教學計畫來彼此競爭。再者，跨域教學、強調社會責任與在地連結往往是當代教育實驗的重點，跨域可能指涉跨學科，也可能是跨出課堂與校園；強調社會責任與在地連結則涉及與在地組織的協作，希望藉此培養學生對於在地社會與公共議題的認識與關懷。這些規範性關懷當然志向遠大，然而對於基層教師而言，在計畫執行上彷彿是摸著石頭過河，不僅戰戰兢兢，也充滿挫折。或許有些經驗因人而異，然而也可能反映出當代臺灣高教現場的

* 本文受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作者感謝山東野表演坊在三年共事過程中的協力與包容、范麗娟老師與顧瑜君老師在計畫提案與書寫時的鼓勵和建議、楊靜利老師與呂傑華老師對於本文投稿的鼓勵，以及《新實踐集刊》兩位匿名審查者的寶貴意見與刊物編輯細心的文字修正。

** 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Email: youlin@gms.ndhu.edu.tw

普遍狀態，甚至是朝向競爭型計畫轉型的非預期後果。本文書寫立基於我在教學上與花蓮在地劇場協作近三年的故事，透過獻醜式的拋磚引玉，分享個人經驗與思索。

關鍵字：高教轉型、跨域教學、大學社會責任、大學社會（區）
參與、競爭型計畫

楔子

2020年7月11日晚間，就在演藝活動因新冠疫情停擺近半年後逐步復甦期間，山東野表演坊（以下簡稱山東野）的《富世漫步》社區劇場正式開演，山東野團長在演出結束後的短片提到這個劇場的起源，是與一群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學生一起決定到富世部落做些事，¹到底這段故事是怎麼發生的呢？故事本身又呈現哪些關於當代高等教育的現場與實作反思呢？

在臺灣晚近一波的高教轉型過程中，競爭型計畫的出現是一個特點，教育部持續以競爭型計畫推動各種教育實驗，也連帶地改變大學中教育資源的分配方式，如今有不少經費分配是教師需要提出教學計畫來彼此競爭，在與評鑑制度等績效主義結合下，系所能有多少師資員額，甚至系所存續與否，都可能視其取得多少外部計畫而定。再者，跨域教學、強調社會責任與在地連結往往是當代教育實驗的重點，跨域可能指涉跨學科，也可能是跨出課堂與校園；強調社會責任與在地連結則涉及與在地組織的協作，希望藉此培養學生對於在地社會與公共議題的認識與關懷。

這些規範性關懷當然志向遠大，然而對於基層教師而言，透過競爭型計畫嘗試在教學上連結在地與進行社會實踐，在執行上彷彿是摸著石頭過河，不僅戰戰兢兢，也充滿挫折。或許有些經驗因人而異，然而也可能反映出當代臺灣高教現場的普遍狀態，甚至是朝向競爭型計畫轉型的非預期後果，²本文書寫立基於我在

1 請見山東野表演坊官方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ShanDongYe/posts/10158040050212912>

2 例如蔡博方（2019）指出，競爭性計畫下新型態的管考制度所帶來的就業風險，主要由博士後研究員與專案教師等非穩定工作者所承擔，難以逆勢抵抗高等教育勞動條件的惡化，且可能犧牲許多新進／非穩定學術工作者的職涯，甚至造成學術社群在世代交替上

教學上與花蓮在地劇場協作近三年與執行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故事，透過獻醜式的拋磚引玉，分享個人經驗與思索。在開始之前，有兩點需要先行說明，首先，教育部的競爭型計畫多樣，即便是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涉及社會責任與在地連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本文的討論限於此類別，至於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其他競爭型計畫的經驗與執行實況，就留給讀者判斷；³再者，本文無意為我所執行的計畫，乃至於整體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或其他競爭型計畫的成敗下定論，這遠非一篇記錄與反思性文章所能處理，只有當更多底／基層高教工作者願意直視且書寫經驗，才有可能。

第一幕：邂逅劇場

細說從頭，需要回到 2017 年，我剛到花蓮任教的那一年年底，我原先是戲劇的門外漢，然而當時被一位朋友拉去參加山東野的「玩一齣戲——戲劇教育實作與應用工作坊」，⁴這個工作坊是使用「論壇劇場」的形式，由劇場「丑客」（curinga）⁵引導參與者探討性別平權與校園霸凌的議題。老實說，我當時是因人際

的長期折損。再者，將計畫執行成敗歸因於個別執行者或個別學校的個體化歸因，也使透過集體行動改善高教處境變得更不可能。陳玉芊（2019）則觀察到，競爭型計畫管考效應展現在計畫執行上，因求快而缺乏跨領域、跨層級協商與共識形成的可能性，後果可能是強勢學科依然強勢，人文社會學科專業的弱勢處境未能被翻轉。

3 曾美芳（2019）曾記錄藉由教育部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推動自主學習課程的實況，或許可以提供參照。

4 這位朋友是在國立政治大學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的伙伴，日後與山東野表演坊的團長成了人生伴侶。

5 劇場丑客的功能是，在劇情爆發矛盾最高點時現身，引導觀眾思考劇中角色所處的困境，並鼓勵觀眾上台取代角色，演繹新的解決方案（劉欣韋、曾令愉，2018）。

關係而去，卻相當驚艷，原來，戲劇的面貌有別於自己過往的想像，不只具有專業演員在演藝廳演出的形式，也具備讓觀眾一起熟悉與討論公共議題的可能性。

為何對我而言這樣的可能性是重要的呢？這來自作為一個新入門不久的大學教師在教學上的感受：多數學生未必有興趣閱讀深度掌握社會議題的文本，且習慣教師們給他們答案，而非思辨與共同討論。此一趨勢加上晚近教學上強調大學生的「社會實踐」，所帶出來的結果卻可能是充滿各種「自然主義」的實踐，這意味著當社會學知識要求必須與常識斷裂時（謝國雄，1997：307-309），社會實踐所定義需要被處理的「社會問題」，卻往往建立在未經反思的直觀經驗或官方說法等常識之上。面對這樣的教學場域，倘若是一位充滿魅力型個人特質的教師，或許足以帶領學生在公共議題上衝鋒陷陣，但自我衡量，自己並沒有這種本事，因此如何在教學上找到更容易使同學願意參與公共議題思辨與討論的形式，成為一大挑戰。讓學生擔任素人演員並以較接近遊戲的方式參與在「論壇劇場」中，以及該劇場本身「換位思考」的特質，或許可以引發思辨與討論興趣。

再者，基於公共社會學將知識與大眾溝通的關懷下（Burawoy, 2013），論壇劇場也可以是一個知識與公共議題溝通的渠道（Soeiro, 2013），特別是在晚近花蓮面對眾多因大型觀光設施及基礎建設引發的環境、族群正義等公共議題時，如果同學們可以在山東野的協力下鍛鍊出與大眾溝通的本事，應是深化知識公共性與社會實踐的可能方向之一。

第二幕：初試啼聲

在上述思維下，我在教學上有意地引入論壇劇場，第一次與山東野合作是 106-2 學期，透過校內的「三創教學課程」機制，⁶以「社會研究法（二）」⁷課程申請經費，邀請山東野兩位成員至課堂上進行兩次共六小時的戲劇工作坊。由於當時勞基法修法爭議正沸沸揚揚，因此課程設定的教學目標是使同學藉由調查花蓮各種行業的勞動條件來學習研究方法的操作，且在期末能夠將課程作業成果轉換成一場「論壇劇場」。

合作過程遠非順利，首先始料未及的是學生的異質反應，原來認為素人演員「玩一齣戲」的「玩中學」是同學們比較容易接受的學習方式，後來才發現這恐怕是我的一廂情願，部分同學喜歡看劇但不願意嘗試演戲，一些透過傳統學習方式就能取得學習成效的同學，認為戲劇工作坊等於要求他們做更多功課。⁸另外，「論壇劇場」的操作需要肢體律動的暖身與破冰時間，也由於該劇場強調丑客們融入社區，與參與的社區居民建立關係，因此需要透過遊戲與社區團體「玩」在一起（謝如欣，2018：41），再加上當時我對論壇劇場的認識相當有限，未能加以解釋，這也讓

6「三創教學課程」實為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的一環，校方列為 107 與 108 學年度計畫成果（參見 <https://b008.ndhu.edu.tw/files/13-1010-147927.php> 與 <https://b008.ndhu.edu.tw/files/13-1010-133139.php>）。在直接分配給系所的經費日漸減少下，通常新進教師會被期待提案，為課程取得更多教學資源，以 106-2 學期為例，共有 40 門課程，補助經費為 126 萬 5 千元（參見 <https://www.ner.gov.tw/news/5b3b1e1144ec670006e54a45>）。近幾年的狀況是，每學年度由同一位教師開授的必修課程都需要一再申請，而且要求每次申請時都要構想出新花樣，必須書寫和上一次課程計畫的差別。

7 課程著重質性研究方法。

8 針對不願意參與戲劇工作坊的同學，由教師與同學協商其他的作業與評量方式，其中一份出色的期末作業〈每天工作 12 小時，25 歲保全過勞死〉刊登於《人社東華》第 19 期，參見網頁：<http://journal.ndhu.edu.tw/category/2018/> 第 19 期 /page/2/

部分同學認為這是缺乏學習目的的玩耍，浪費寶貴的課堂時間。

然而總體而言仍有一定的回響，山東野的團長表示同學參與期中戲劇工作坊時所呈現的勞動調查內容給了他靈感，在期末創作了《爆炸的那一天》論壇劇場，由山東野的成員扮演丑客，引導同學們討論勞權議題，也開啟一群同學與山東野後續的合作。不過讓我們先暫且放下這段協力故事，之後再說，先來看看比較慘烈的教訓。

第三幕：書寫計畫

2018年初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開始徵件，老實說，當時我對這個計畫興趣缺缺，一方面是過去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的創傷陰影仍在，再者，徵件在即，卻很少人能具體掌握「教學實踐研究」的內涵，即便讀完何謂「教學實踐研究」說明，⁹恐怕大部分大學教師仍不清楚那到底是什麼，¹⁰更何況不只是教學實踐，還要研究自己的實踐，這到底如何可能？最重要

9 根據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網站，教學實踐研究指「教師為提昇教學品質、促進學生學習成效，以教育現場或文獻資料提出問題透過課程設計、教材教法、或引入教具、科技媒體運用等方式，採取適當的研究方法與評量工具檢證成效之歷程」。參見網頁：<https://tpr.moe.edu.tw/plan>

10 此處涉及的一個關鍵是「實踐」到底如何界定？如果依據晚近對大學社區實踐（university community engagement）的討論，實踐必須具備帶來改變的行動取向與轉型性議程（transformative agenda），而不只尋求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中執行（Hall et al., 2011），然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所界定的實踐呢？從徵件前校內說明會的討論中，可以看出有些教師談的是教案、教材與課程設計的改善以增進學習效果；有些教師則認為這些還稱不上實踐，實踐是要嘗試翻轉結構，例如設計出不同的評量方式評估來自都市與鄉村的學生的學習成果，使享有較少教育資源的學生不會因為在標準化測驗尺規下遭受挫折後就喪失學習意願，這或許就較具備轉型性議程的意義。該場討論顯示出的是，高教工作者對何謂教學實踐還未有普遍的共識。

的，我認為造就當代學生學習現況的因素多來自結構性的變遷，例如就業環境的變動與「高教崩壞」現象（戴伯芬，2015a），要求大學教師在個別課堂教學上提出因應方案，等於是將結構因素化約為個體責任，更需要的恐怕是集體行動。

於是一開始的寫作其實是「抗議式書寫」，試圖透過計畫書，闡述將結構性因素化約成個體責任是不適當的，期待有機會看到這份計畫書的審查者會有共鳴。事後看來，這個初衷太天真。當時沒想到的是，原來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提案不像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可以直接上達天聽，而是要求校方把守第一關。原先以為這份計畫構想鐵定被打槍，沒想到負責審查計畫構想的顧瑜君老師認為很有繼續發展下去的潛力，加上已故的范麗娟主任勸我提案，促成後續的計畫書寫。

事實上，我之所以正面回應范麗娟主任的勸說，也來自於當時自身與系所面對的壓力。一方面，在近年來各種競爭型計畫與評鑑制度的績效主義推動下，即便本校不是私立大學，然而下至系所，上至校方，對新進教師的期待早已不只是取得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能多取得其他外部計畫，在未來升等或評鑑上至少多幾分被秤斤論兩的籌碼。另一方面則是在當代高教朝向學用合一的理工科思維下，「博雅教育」相關系所所遭遇的危機（陳怡方，2017），再加上歷經晚近大學機構整併過程的遺緒。在此脈絡下，一個被整併到新學校，且看似與就業市場缺乏對應關係的「博雅教育」系所，在校內學術科層下相當邊緣，即使師資人數長期低於教育部規範，當時的校方也不願意增聘，面臨系所評鑑時只得向其他科系調借教師因應。¹¹ 范麗娟主任積極爭取新聘教師，也

11 歷經併校、系所調整與原任教師陸續退休後，本系自 2013 年起長期缺額，直至 2017

很清楚必須拿出成績才可能向校方爭取本就應該聘足的缺額，而所謂的成績包含取得外部計畫，這顯示在競爭型計畫普及後，其存在早已影響大學中各種資源（包含教師人力）的分配面向，影響系所等教學研究單位的日常運作，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下，即使任職於國立大學，對於新進的基層教學研究人員而言，提案壓力仍難以迴避。

或許對於許多新進教師而言，既然難以迴避，只能承接，並試著多少加進自身想實踐的教學想法，這也是我當時的選擇，於是轉換計畫書寫的思維，回到比較正規的書寫內容與格式。同時，也由於初次與山東野合作似乎有些回響，因此想擴大合作規模，由此來看，即使在面對提案壓力下，書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不至於是「為申請計畫而申請」，畢竟這份計畫並非憑空出現，而是基於校內「三創教學課程」的延續與擴張。就計畫內容而言，這份以大三上下學期必修之「社會創新」及「社會實踐方案」課程提出的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構想是在「社會創新」課程中每隔三到四個禮拜，當課程每進入一個新單元時，山東野針對課堂讀本設計一次論壇劇場，引導同學們參與討論，期末再由同學們根據自己感興趣的議題，在山東野的指導下完成一齣論壇劇場的創作與公開演出，也期待在下學期「社會實踐方案」課程中，同學們願意與山東野繼續合作，透過所創作的論壇劇場進行公眾溝通。提案名稱取材自上述 2017 年底那場戲劇工作坊，標題為「玩一齣實踐之戲：結合社會創新及實踐與戲劇教育的教學嘗試」，該案幸運地通過審查而獲得經費補助。

年因一位教師轉任他校，師資人數降到六位時，校方才同意增聘一位，在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首度徵件時，仍缺額兩名。

第四幕：計畫執行

當時雖然已經預見計畫執行會是個挑戰，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執行初始的張力卻幾乎把我撕裂。張力來自兩個部分，其一來自身為授課教師的我與部分課堂學生之間，上學期已經對引入論壇劇場有所不滿的同學們出現更強烈的反彈，學期初始即有同學提出異議，認為教師應該要增強自己的講演功力而非試圖以引入論壇劇場的方式來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再者，部分修課同學認為傳統透過閱讀文本、聽課與考試的學習方式有比較客觀的成績評量標準，也比較能掌握在一門課程上需要花費的心力與時間，以論壇劇場創作作為成績評量方式為他們帶來更多不確定性，因此自認為是「課程的受害者」。儘管在與這些同學溝通討論後，確定不參與論壇劇場的同學的成績評量方式將回到傳統的期末書面報告形式，然而這股張力不僅影響課程中的師生關係，還進一步深化山東野與身為計畫主持人的我之間的歧見。

第二個張力源自我對於劇場，尤其是論壇劇場缺乏足夠認識，只能在提案過程中邊做邊學與憑藉自身的想像，一旦有太多錯誤想像，也就難以實際執行。107-1 開學後的討論中，山東野成員告訴我，關於「社會創新」課程部分必然需要調整。第一，與我原先的想像不同，論壇劇場並非是一個套裝產出，可以快速地被複製到不同場合重複操作，實情是，每場論壇劇場需視場地與參與成員不同，都要重新排演過，山東野不可能有能量支援這麼多場論壇劇場，而且，山東野自身有演出接案與正在從事的創作，只能提供既有與正在創作中的劇本，沒有能力為課程創作新的論壇劇場。第二，身為劇場工作者對於美學教育有所堅持，即使是帶領素人從事劇場創作與公開演出，在美學上必然需要達到某種門檻，不僅劇本創作需要時間，排練也需要大量時間，然而

課程所給的排練時間太少，除非安排額外的排練課程，否則山東野可以配合的只剩一個學期進行兩次論壇劇場的選項。

至此，讀者或許會問，為什麼身為提案人的我不在書寫與執行計畫之前先熟悉應用戲劇這個領域？為何沒有與山東野充分溝通討論？關於第一個問題，我不確定在當代高教工作環境下的新進教師，在進行跨領域嘗試時有沒有這個條件。由於跨界進入的領域通常跟教師過往的學術養成相當不同，需要耗費相當的時間才能熟悉，然而多數官方計畫徵件從開案到截止的時程很短，再加上新進教師有著作升等、計畫業績與面對教學評鑑等要求，這使得在面對提案壓力下，先對某個新領域認識到一定程度後再行提案的空間幾乎不存在，邊提案邊惡補恐怕才是常態。¹² 關於第二個問題，事前當然曾與山東野進行討論，我曾口頭上簡略陳述合作構想，取得山東野團長的協力承諾，也寄送了計畫構想的電子檔。然而這遠非充分溝通，部分原因來自上述，涉及徵件期程與當代高教工作環境，另一部分原因來自在地組織的特性，當時山東野成員只有兩位（目前三位），都是返鄉的斜槓青年，在面對自身的生活與生計情境下，可以討論的時間相當有限，而劇場組織亦面對許多不確定性，例如向其他單位的提案通過與否，是否臨時接到其他演出邀請等等。¹³ 在此情況下，透過充分討論取

12 如果是以案專教師或博士後研究員為主要發展基礎的計畫書寫與執行下，狀況顯然更慘烈，「大部分專案教師與博士後研究人員都被迫放棄自己的專業，重新學習一個與自己截然不同的新領域」（曾美芳，2019：258），可以想像，在不受勞基法與教師法保障下，這樣的被迫學習恐怕有時近乎血汗程度。相較而言，新進的專任教師或許比較不用被迫學習新領域，學習新知本身也是件好事，但並不意味在有提案壓力下，以及出版、評鑑與教學時數要求下，教師在計畫書寫與執行前還能有充分餘裕，對某個新領域具備一定的知識與理解。

13 任教於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的 Sarah E. Dempsey（2010）指出，在地工作者在有限的時間與資源下，強調的是增加社區內部的對話，不見得願意多花心力與大學端對話。

得共識後再提案便成為一個奢求，計畫具體細節的討論付之闕如，即便連通過審查後到開學前的時間，雙方都還是各有所忙，一切都只能等到開學再且戰且走。

107-1 開學後與山東野團長的討論中，儘管我認知到計畫的確需要調整，然而雙方在一些歧見上無法取得共識。當時我無法理解劇場工作者對於美學與藝術層次的堅持，也傾向認為論壇劇場應該是一項探討公共議題的工具，¹⁴ 只要在課堂上帶領同學認識這套工具，有些基本動作的操作，就足夠了；況且我開設的畢竟不是戲劇相關科系的課程，部分同學也已經提出異議下，不可能在課堂之外增加排練時間。再者，我不認為在學期中由山東野帶領同學進行兩次探討公共議題的論壇劇場是個選項，因為這等於停留在 106-2 的結果而沒有進展，我能接受的是進行一次論壇劇場，但堅持期末要有一部同學們創作的論壇劇場，並進行公開演出；然而對於山東野而言，每場公開演出都關乎其組織聲譽，無法同意輕率行事。

事後想來，似乎當時的自己竟也沒擺脫計畫執行需要 KPI 的思維，這場討論不歡而散，根據其他友人傳來的消息，團長感受到雙方的合作關係並非對等，而是階序關係，是我憑藉計畫所提供的經費掐著山東野做事。但山東野之所以願意繼續合作，其實是基於已經建立的社會關係，根本不是因為遠非充沛的計畫經費所驅動。眼見表定第一次論壇劇場時間即將到來，在內有學生提出異議，外有與山東野的僵局，且意識到所建立的社會關係瀕臨破裂之局，我持續自問，這樣執行計畫有意義嗎？似乎只是自傷

14 謝如欣（2018：38-41）已指出，在有限的時間與認識不足下，的確可能將論壇劇場理解或操作成「一種以戲劇形式應用在社會議題的方法」，忽略論壇劇場具備的戲劇美學與娛樂性質。

且傷人，那為何要這樣做？當時幾乎做出放棄執行計畫，將經費退回教育部的決定。¹⁵

在此需要再一次對山東野千謝萬謝，在相當不愉快的氛圍下，仍然願意支援所排定的論壇劇場（當時我已有因開天窗而調整課程的心理準備），帶來剛創作完成不久，探討東南亞移工議題的論壇劇場。事後我再次邀請團長與藝術總監聚會，他們除了接受我的道歉賠罪外，也建議期末的成果發表修正為同學們以東南亞移工議題分組創作短劇並演出，演出只限於課堂內。此外，為了準備成果發表，山東野將提供劇本創作的指引，而且劇本創作與排練過程不占用課堂時間，由各組與山東野自行約定課堂外時間進行（等於是沒有講師費的志工服務），也期待在 107-2「社會實踐方案」課程中，有組別願意在山東野的協力下繼續深化，進行該議題的短劇或論壇劇場創作及演出。老實說，面對這樣的情義相挺，頗令人感到無地自容。

第五幕：還石於山

事後看來，107-1 的計畫執行稱不上有所建樹，沒有任何組別在 107-2 延續與深化 107-1 期末的短劇創作及演出，遠不如 106-2 的後續故事開展。時間倒回 106-2 期末，本系有一群相當關心環境議題的學生，他們早已與包含臺灣環境保護聯盟花蓮分會（以下簡稱花蓮環盟）在內的在地公民組織建立關係，當時花

15 當時已經想到，也在後續幾年多種情境不完全相同的場合見證到，如果真的決定退回計畫，恐怕難免受到各級學術科層的注目與非議。或許受到注目並非壞事，但遺憾的是，往往不是檢討制度上的問題，而是個人歸因。

蓮環盟正籌畫「還石於山：花蓮山石年環境映像文件展」（以下簡稱「還石於山」），¹⁶ 他們參與其中，此一行動在本系陳素梅老師的指導下，成為這群同學修習「社會實踐方案」課程的方案執行，也連帶地使山東野成為「還石於山」的協力組織，在展覽期間進行四個場次的「《爆炸的那一天》環境戲劇工作坊」（以下簡稱《爆炸的那一天》）。

《爆炸的那一天》脫胎於山東野在 106-2 期末的創作，儘管設定的場景是一座化工廠，卻是以 1988 年亞洲水泥花蓮廠的工安事件引發的傷亡與工會行動為基礎，¹⁷ 探討一項高污染性產業除了帶來環境傷害外，所創造的就業機會未必能保障基本勞權與提供穩固的勞雇關係。此一論壇劇場的丑客與演員均由本系同學擔任，帶領參與群眾進行議題討論。

這個論壇劇場開演後在花蓮受到一定矚目，其中一位參與的同學與山東野團長應邀到燕聲廣播電台介紹「還石於山」與《爆炸的那一天》，¹⁸ 在地劇場評論人盧宏文（2019）在「表演藝術評論台」網站上撰寫專文評論，指出儘管探討公共議題的論壇劇場近年來在花蓮常見，然而《爆炸的那一天》的特殊處在於由大學素人學生而非受過應用劇場訓練或有戲劇背景的專業劇場工作者來擔綱（也再次顯示我於 107-1 的原初計畫成果設定有多麼無知與荒謬）；此外，也指出該劇場的缺失與可能繼續深化的方向。我深有同感。

16 「還石於山」的官方粉絲頁為：<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647809588853745>

17 相關報紙報導即為「還石於山」的展示文件。

18 參見「還石於山」官方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hualien.30/posts/864939260526586?comment_id=865018510518661

《爆炸的那一天》主要的問題來自同學們雖有社會學學徒的關懷，卻對勞動法規、勞動現場以及組織不同層級受雇者的困難只有淺薄的認識，誠如盧宏文的評論中所指出：

如何藉由這些設定讓參與者對化工廠裡的人，可以建構出立體且複雜的形象，並且接近這些人的真實處境。甚或是，在議題之前，我們知道一名化工廠工人的作息時間和生活習慣嗎？在我們針對員工訓練不足、超時工作進而醞釀罷工的討論前，參與者有辦法細數一名鎮日疲憊不堪之工人，要站到資方的對立面，需要背負多少的犧牲嗎？這些透過充足的前提設定，所帶給引導者和參與者雙方的思辨，才是戲劇工作坊於冰冷的現實困局中，撐開一點想像力罅隙的根基。

一方面指出不足之處，然而不也顯示出，如果能裝備更深刻的社會學知識，就可能產出更精緻的論壇劇場創作與演出！

第六幕：漫步富世

儘管有所不足，然而對我而言，這趟旅程其實已經走得夠遠了，但山東野與一些參與「還石於山」的同學們顯然還想走更遠。由於在「還石於山」中曾與「反亞泥，還我傳統領域自救會」合作，山東野、花蓮環盟，以及參與的同學決定一起到富世村做一些事，也由於素人演員在論壇劇場操作上的不純熟，山東野決定降低閱聽觀眾參與的比重，朝向社區劇場調整。在此思考下，山東野、花蓮環盟，加上臺灣原住民族太魯閣族學生青年會聯手提案，取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與花蓮縣文化局 109 年度社區營造

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經費補助，從 2019 年 11 月起進駐富世村進行《富世漫步》社區劇場創作，也希望大學端能夠提供蒐集創作素材的田野調查協助。

時值 108-1 期末，多數透過大二「社會研究法（二）」課程開始結識山東野的同學已然剩下最後一學期的大學時光，各有其生涯規劃，漸漸退出與山東野合作的行列，於是我嘗試再以「社會研究法（二）」課程向校內「三創教學課程」提出經費申請，用以支持學生的車馬費與保險費。有鑑於之前部分同學的反彈，這次不擴及全班，而是打算招募一個四人的「富世小組」，¹⁹ 利用週末的時間隨山東野進入富世村，除了操作質性研究方法完成課程報告外，也協助取得劇場創作素材；如果願意的話，在學期結束的暑假期間繼續參與後續社區劇場的創作、排練與演出工作。山東野團長曾跟同學們說，即使不願意擔任演員，劇場演出還是需要許多後勤工作人員。

108-2 學期初始時，有意願參與「富世小組」的同學遠多於四位，只能抽籤決定。²⁰ 實際課程進行時則差強人意，部分同學取得排他性的學習機會後卻未好好珍惜，在山東野進入富世村的時間請假，最終也影響課堂作業品質。平心而論，同學們的期末報告內容大抵上都出現在《富世漫步》中，從正面思考來看，這顯示山東野透過田野調查收集到的創作素材，同學們至少還能掌

19 花蓮在地公共運輸沒那麼方便，山東野在考量其交通接送能力與在富世村的據點空間，只能接受四位學生。

20 沒機會參與「富世小組」的同學組成另一個小組進到秀林鄉和平與和中部落，由在和和中部落開設「尼谷那書房」的本系研究生協助進行研究操作，亦由課程經費支持其車馬費與保險費。關於「尼谷那書房」的資訊，請參見其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nikuna20190401>。

握到，然而這遠非課程所期望的，由同學們透過質性研究方法操作取得調查成果後，再轉而成為劇場創作素材；同時，期末報告內容看起來更接近一篇報導，缺乏清楚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提問；再者，學期結束後，沒有同學願意參與後續創作、排練與演出工作，這引發一位沒機會參與「富世小組」的同學質疑授課教師的安排，認為自己具備一路參與到最後演出的強烈動機，學習機會卻被其他同學所佔據。

其實走得跌跌撞撞，一路上是山東野給我與同學們的澆灌更多。從《爆炸的那一天》到《富世漫步》，對我而言是另一次的撞牆，目前，仍望著牆面，不知是否能穿牆或越牆而過，還是該轉身背對、遠離？

第七幕：謝幕之後

《富世漫步》的謝幕，標示著與山東野三年協作歷程的暫時性句點，如果說這段跌跌撞撞的旅程對於我如何看待近年來高等教育朝向社會實踐轉型及強調大學社會責任、在地深耕與連結的風潮有些意義的話，或許可以歸納成幾點初淺的經驗談。

首先，跨域教學不意味著引進學科外或學術機構外的業師即可，事實上需要授課教師對業師的專業與所處情境脈絡有相當程度的認識，這對於過去在既定研究領域養成的大學教師而言，需要足夠的時間熟悉跨域知識與情境。然而在當代專任教學人力精簡，教學負擔沉重，即便減授時數等相關規範已成為制度，部分校方卻不見得願意確實執行，再加上新進教師依然需要面對著作升等期限、教師評鑑的績效主義與管理主義的行政要求，是否真

的可能具備在計畫書寫前先熟悉新領域與情境的餘力？還是可能快速地將教學熱情燃燒殆盡？²¹

誠然，造成當代教師面對跨域教學處境的經驗不只是源自教育部的各種競爭型計畫補助制度，也鑲嵌在個別學校對於教師申請計畫的期待或要求，以及校內制度中。²² 例如部分學校期待與要求教師取得計畫，卻不願意建立或實行制度性鼓勵，然而一旦把焦點放在個別學校，只看到校際差異，可能會陷入蔡博方（2019：211）所描述之不同層次間的「區位謬誤」，即把計畫的「競爭性格」與當代高教在人力精簡、限期升等、教師評鑑與管理主義等方面帶來的效應歸因成各校的「內部問題」。易言之，當主管全國高教的教育部以競爭型資源分配引導大學校務發展，從而改變管理大學的模式（戴伯芬，2015b：41-42），同時卻對專任教學人力精簡、教師專案與兼任化，與教學負擔沉重等現象雙手一攤，彷彿這些都是個別學校的「內部問題」，未正視本身的作為可能惡化這些現象，也未積極推行其他得以矯正現象的政策與管制作為。令人質疑的是，為什麼政策重點不是積極回應相關倡議，先力求降低師生比，²³ 甚至拉高教育部部定的最低師資員額要求？如果這些面向無法先行改善，將難以創造出熟悉跨域知識與情境的有利條件。

再者，嘗試以正式課程促成學生與公民團體協力的努力成效相對有限，真正能產生較長期與深入協力關係者，多半是原本就

21 剛任教的 106 學年度，我的學分數是 19.8，即便在同時執行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與一個科技部個人專題研究計畫的 107 學年度，學分數仍達到 16，儘管隨著本系教師陸續甄補，情況有所改善，然而，發生在這兩個學年度的故事到底是當代臺灣高教現場的異常，還是日常呢？

22 感謝一位評論人指出這一點。

23 事實上，降低師生比以提升教育品質，一直是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因應當代高教崩壞現象所進行的倡議重點（戴伯芬，2015a：325-326）。

關注某些公共議題，且與在地公共行動社團已經建立關係的學生，即便沒有課程要求與學分授予，這些合作依然會發生。易言之，與其從上而下地訴諸教師權威與大學科層體系加以促發，倒不如期待學生的自願性由下而上地產生影響，在課程上保有同學們針對其關切的公共議題有所發揮的可能性，認可同學們與相關組織的合作，或媒合適合的公共行動社團。

第三，大學課程與在地組織合作必須秉持合作本身即目的之信念，而非將其視為達成某些目的之手段，並且保持非正式性（informality）的空間。一方面，對於在地組織而言，之所以願意合作，通常是因為既有社會關係下的情義相挺，也覺得合作本身就是一件有趣或值得去做的事，不適宜被大學端視為是取得計畫經費或達成某種教學目的的工具，當然亦非追求社會實踐與大學社會責任的工具；另一方面，保持非正式合作關係使大學端得以因應在地組織所面對的狀況加以調整，且肯認合作雙方在課程之外的日常交誼關係正是得以相互協力的基礎。

第四，在較為抽象的層次上，由下而上的協力關係、非正式性、合作本身即為目的等議題涉及過去 political left 與 social left 之間的辯論（Sennet, 2012: 35-64），昔日 Karl Marx 無情地攻擊 Peter Kropotkin 及 Robert Owen 等人，political left 與國家社會主義大行其道，然而在國家社會主義早已解體與 social left 的智識

24 Ricard Sennet (2012) 在重新找回合作（cooperation）這種人類技藝（craft）的討論中即著重 social left 的智識傳統。這樣的智識傳統被應用在尋找主流資本主義與現代國家治理之外的另類模式上，例如 Andrej Grubacic 與 Denis O'Hearn (2016) 提出結構性逃離（structural escape）的可能性，探討試圖逃離現代國家治理與資本主義經濟過程的社群，在 James C. Scott (2009) 所描繪的地理性逃離隨著現代國家發展「距離消除技術」（distance-demolishing technologies）而難以為繼下，儘管免不了與現代國家與資本主義體系發生關聯，但透過實踐社群內「互助」（mutual aid），以自我組織的方式確保社群的自主性與持續繁衍，這樣的論點即立基於 Kropotkin 的看法。此外，晚近臺

傳統再度受到重視的今日，²⁴ 更接近從上而下、制度化與將合作視為工具的競爭型社會實踐或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推動似乎有些時空錯置，這條路值得再走下去嗎？如果再考慮當代大學學術科層的發展（戴伯芬，2015b），傾向以上而下的層級命令體系加上非正式壓力取代自主性合作下，該被檢討與挑戰的恐怕不是「為申請計畫而申請」的個別教師，反而是創造出「為申請計畫而申請」壓力（即便是非正式的）的制度結構。

第五，與上一點相關的是公共經費分配方式與效益的議題。撥了一下算盤，三年歷程中，兩個「三創教學課程」計畫經費合計 47,000 元，加上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經費 217,000 元，合計 264,000 元，平均一年不到九萬元，扣除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每月五千元的主持費、填補校方撥給不足的助教費用，以及校外教學參訪費用，實際上用於與山東野合作的經費比重有限，對比於山東野、花蓮環盟與臺灣原住民族太魯閣族學生青年會聯手提案所取得的專案經費，相當微不足道。顯示高等教育端能提供的經費資源對在地組織而言助益不見得大，但些許經費足以在同學們與山東野的協力上多少起點推波助瀾之功，以單位金額來看，應該頗有效益。

透過以上算術想表達兩點，第一點是，不少公共行動社團相當具有提案能力，不需要透過大學社會實踐與社會責任相關計畫經費才能推動其事功，且與這些組織維持由下而上及非正式性合作所需經費並不高，並能夠有所小成。相較而言，當代大型社會

灣學界在談社區經濟（community economy）時常援引的 *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其作者 J. K. Gibson-Graham（2006）理解的社區經濟亦相當具有 social left 的傳統，從其堅持 communism 仍然是、且越來越具開放性的思想任務，並指出 Owen 的合作社主義在左翼工會政治發展歷程中被邊緣化的事實，不難讀出 Gibson-Graham 理解的社區經濟不同於小規模在地導向的資本主義企業，而是試圖推出 Owen 式的社會主義實驗。

實踐與社會責任的推動設想的是編列較大規模的計畫預算經費補助，創造提案與執行誘因，並期待執行者在相對短期間內創造出「亮點」，然而所謂的「亮點」想像有時相當主流，指涉翻轉式地改變在地處境、解決社區問題、創造產值，或滿足某些協力組織的資源需求，並得動員第一線計畫執行人員（通常是專案助理、博士後研究員、專案教師，以及尚未升等的新進教師）爆肝式地準備各種展示給管考單位的成績單，從計畫執行到考核上幾乎呈現人仰馬翻之景。在這樣的「亮點」想像與競爭型計畫管考下，計畫執行的挫折與些微小成，往往不見得是計畫管考單位或校方行政高層願意接受與認可的。由此看來，或許值得討論的是，當代大型社會實踐與社會責任以及相關教學活動的推動方式是否可能顯得大而無當？

最後一點是，上述指出不少公共行動社團相當具有提案與獲取經費能力，這裡的重點並非是大學與在地組織協力不需要經費，而是如果所需經費不多便可能有所小成，且在與其保持由下而上及非正式合作關係的考量下，那麼需要大學教師多花時間撰寫競爭型計畫嗎？更何況這些計畫往往定位在先導性質，後續維持需要各校內部經費支持，這往往很難期待，開展出來的嘗試之路也就很難再走下去，因此，以競爭型計畫的思維作為主要經費支持模式其實對真正嘗試改變的學校而言相當不利（曾美芳，2019：258）。延伸而言，對真正嘗試改變的教師也不見得有利，即使是個人計畫性質的課程相關計畫，我很難想像這些計畫結束後，有多少校方真的願意提供相應經費，讓教師嘗試跨域與具備社會實踐及在地連結的教學實驗？對比過去教育部與校方將教學資源直接撥用到學校與系所的作法，競爭型計畫真的利大於弊嗎？還是，堅持以競爭型計畫推動大學社會實踐與社會責任，以及相關教學實驗，本身就是一種迷思呢？

參考書目

A. 中文文獻

陳玉苹，2019，〈跨領域還是換領域？行動研究田野工作省思〉。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14：261-274。

陳怡方，2017，〈高等教育轉型的人類學反思：以社會實踐課程
的經驗為例〉。《臺灣人類學刊》15(2)：147-184。

曾美芳，2019，〈「自主學習」：未來大學的革命還是實驗品〉。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14：247-260。

劉欣韋、曾令愉，2018年4月6日，〈劇場裡的社會課：論壇
劇場以「丑客」瓦解第四道牆，引發思辨能量〉（取用日
期：2020年9月18日）。檢自：[https://www.thenewslens.com/
article/92652](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2652)

蔡博方，2019，〈人社知識實踐型計畫的美麗與哀愁〉。《台灣
社會研究季刊》114：201-218。

盧宏文，2019，〈越細膩，越可能《爆炸的那一天》環境戲劇
工作坊〉（取用日期：2020年9月19日）。檢自：[https://
pareviews.ncafroc.org.tw/?p=34610](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34610)

戴伯芬，2015a，〈朝向高等教育的轉型正義〉。頁320-344，收
錄於戴伯芬主編《高教崩壞：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
的危機》。臺北：群學出版社。

戴伯芬，2015b，〈學術官僚主義的擴張——民主化與高等教育轉型正義〉。頁 34-72，收錄於戴伯芬主編《高教崩壞：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臺北：群學出版社。

謝如欣，2018，《被壓迫者劇場發展史：波瓦的民眾劇場之路》。臺北：新銳文創。

謝國雄，1997，《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緒論》。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B. 外文文獻

Burawoy, Michael. 2013. "Public Sociology: The Task and the Promise." pp. 279-300 in *Ten Lessons in Introductory Sociology*, edited by Kenneth Gould and Tammy Lew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mpsey, Sarah E. 2010. "Critiquing Community Engagement."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4(3): 359-390.

Gibson-Graham, J. K. 2006. *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Minneapolis &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Grubacic, Andrej and Danis O'Hearn. 2016. *Living at the Edges of Capitalism: Adventures in Exile and Mutual Ai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ll, Peter. V. et al. 2011. "Introduction: Learning from the Social Economy Community-University Research Partnerships." pp.1-26, in *Community-University Research Partnerships: Reflections on the Canadian Social Economy Experience*, edied by Peter V. Hall & Ian MacPherson. Victoria: University of Victoria.

Scott, James C. 2009.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ennett, Richard. 2012. *Together: The Rituals, Pleasures and Politics of Cooperation*.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oeiro, José. 2013. Theater of the Oppressed – A Form of Public Sociology? *Global Dialogue: Magazine for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3(2). Retrieved from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theater-of-the-oppressed-%e2%80%93-a-form-of-public-sociology/>

From a Drama Workshop to the *Fushi Village Walking*: Some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Thoughts Regarding the Project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You-Lin Tsai*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competitive project is one of the main changes of the recent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ese higher educati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continued to push educational experiments by providing competitive grant. It changes the distributive measures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within universities, which requires teachers to apply for teaching funds. Moreover, the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experiments also emphasize on trans-disciplinary teaching, and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Trans-disciplinary teaching refers to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or teaching outside the classroom. The projects of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require teachers to cultivate students' civic consciousness by collaborating with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lthough these normative concerns regarding higher education are very important, it makes teachers burden a lot of uncertainty and frustration when struggling to carry out the educational experiments. While some of them may be attributed to personal factors, others may reflect on the daily routine of contemporary Taiwanese higher education or the unexpected consequences of competitive projects. This paper intends to share my experiences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reflections based on stories from a three-years collaboration between a local theatre and me.

Keywor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rans-Disciplinary Teaching,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niverisity-Community Engagement, Competitive Project